



官渡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,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回“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鸟巢孟德烧粮”揭开了曹操在兵少粮缺的劣势下,战胜兵精粮足袁家军的谜底。

官渡之战,袁绍率领七十万大军围攻曹操,先是筑土山,万箭齐发,后又掘地三尺进攻曹营,可惜都被曹操破解,使战事进入僵持阶段。曹兵不仅兵力匮乏,更大的困难是没有粮草,根本与袁绍“耗”不起。曹操见军中粮草短缺,写下一封书信,派人送往许昌,请荀彧火速征集粮草救急,但送信人被许攸捕获。许攸见到曹操的催粮函后,感觉破曹的时机已到,火速到袁绍处报告,并提出兵分两路,一路打许昌,一路战官渡,可破曹军的建议。可袁大将军,生性多疑,认为许攸与曹操有旧交,献上此信是诱敌之计。更有心腹审配告发许攸的子侄横征暴敛,贪污枉法,引起袁绍更大的不满,遂将许攸轰出大帐,今后不许相见。

许攸见得不到上司的信任,子侄又遭陷害,顿觉走投无路,欲拔剑自刎,一死了之。幸有左右人等拦阻,劝他去投曹营。许攸连夜私投曹营,让曹操兴奋不已。许攸在经过一番考察,认定曹操真心相待后,献上一计,可让袁绍百万之众,三日内不战自破。

许攸之计就是让曹军偷袭袁绍的存粮之地鸟巢。此时,大将张辽担心许攸此计有诈。但曹操用人不疑,命令军

●杂谈京剧与中国传统名著

好而未火的大戏《官渡之战》

贵翔

士打着袁军旗号,束草负薪,人衔枚,马勒口,向鸟巢进发。袁绍选派守护粮台的大将淳于琼是个酒鬼,此时正醉卧帐中,发现屯上起火,已经救之不及。霎时,火焰四起,粮草尽行烧绝。

袁绍失去许攸,丢了鸟巢粮草,大将张郃、高览也投靠了曹操,军心惶惶,四散奔走,只得惨败而归。

这段曹袁征战的故事,可谓斗智斗勇,惊心动魄。不仅情节曲折,扣人心弦,而且结果也耐人寻味,引人深思,可以说是一台好戏的剧本。尤其是原著中,许攸初见曹操时,询问曹操军中粮草尚有几何时,与曹操的那段对话,从问话,到语气、表情,以及许攸的心理活动,就是为马连良先生所设计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孙承佩先生根据《三国演义》和老本《战官渡》编写了京剧《官渡之战》,由北京京剧院众多名家合力将其呈现在舞台上。许攸一角由马连良先生扮演,谭富英扮

演袁绍,裘盛戎饰演曹操,另有,周和桐、谭元寿、马盛龙等饰演重要角色。剧中,马先生扮演的许攸,足智多谋,潇洒大方;谭富英扮演的袁绍,文武兼备,但好谋寡断,志大才疏,刚愎自用;裘先生扮演的曹操,既有头戴相巾,身穿红蟒的丞相造型,又有身披铠甲,手持利刃征战沙场的英姿,其中几个唱段成为裘派的经典。

该剧情节基本上与原著相同,只是袁绍派许攸入曹营劝降曹操那场戏,脱离了原著。但笔者觉得这场戏,除了增加剧目时长以外,并无其他作用。

这台汇集了中国京剧顶级名家的好戏,可惜并没有像《赤壁之战》那样走红,若无京剧配音像将其呈现给戏迷,真有可能被永久遗忘了。



墨池清趣 刘新尧

●丰子恺著《缘缘堂回想录》

本书是丰子恺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深情回望:他写童年故乡的石门湾,写缘缘堂里儿女绕膝的嬉闹日常,写战乱岁月里携家一路南下的逃难颠沛,也写晚年蛰居日月楼的沉静时光。那些早已远去的人与事——恩师李叔同先生、挚友伯豪、朱楼边粉墙下的重瓣桃花——都被他以最温润通透的笔触,一一收进这本书里。

●东来著《她和她的决心》

身为女作家,东来常常感受到某种未知的束缚。为了完成她的写作,

微书评

商皓

她必须模仿男性的视角。而这恰恰就是大多数女性成长时需要面对的困境。此时,东来与她笔下的人物走到了一起,共享着同样被遮蔽的人格与被错置的命运。

●[美国]杜博思著《七场盛宴里的中国》(吴杰译)

作者以七场跨越古今、虚实交织的盛宴为线索,串联中华饮食从古代

珍馐到当代餐饮的完整变迁,用一餐一宴读懂中国社会发展。书中不只讲美食技法与味道,更深挖刀工火候背后的处世哲学、文明交融印记、时代社会转型,以食为镜照见中华文明内核。

●[波兰]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著《温柔的讲述者》(黄珊译)

《温柔的讲述者》里有一个温柔的托卡尔丘克。她始终相信,讲故事就是永无止境地赋予事物以生命。就像一张老照片,如果离开了她长久的凝视,就会变得遥远,变得模糊,不再具有鲜活的记忆,永远停滞在幽暗不明的过去。

《梁漱溟日记》印象

月丫儿

用将近一个月时间,粗略读完上下两册、共八百页的《梁漱溟日记(1932—1981)》。这些日记,是梁漱溟先生39岁至88岁期间的日常生活备忘录,没有大段的议论抒情,每条都很简单。我没有看过梁先生的学术文章,也没有深入了解过梁先生的政治生涯,阅读这套书,是带着一种好奇而非钻研的心态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朋友说,此书就是一本个人修身指南。通读完两册,我才明白朋友此话的真正内涵。

梁先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,有着儒家学者修齐治平的责任感。日记中,梁先生曾明确提到自己是肩负历史使命的:一是1953年,作者于夜醒后,“思年来俗念盈胸,没出息到家,所谓‘古之学者为己’者盖久已忘之。自欺太多太大,如何能负荷继绝学之任?”二是梁先生于1954年做膀

胱肾检查时,“心中清醒反观起种种想,由‘臭皮囊’以至‘父母遗体’,‘形色天性’‘践行尽性’等等而思及宗教与儒家之相反,中国文化价值,人类生命之价值……如是种种,从而念及余所负历史使命之重大”。日记中另有一处令我印象很深:1939年在山东为抗战奔走时,梁先生记录了时任山东省主席任鸿烈为招待作者举办的欢宴上“酒菜奢侈,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,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,更鲜坚苦抗敌之意”,其家国观念可见一斑。

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心性修养,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从梁先生的日记中,我感受到了这一点。其字里行间鲜见愠色,整体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。梁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,除了习拳、读书、写稿,还喜欢散步,于花开时赏花,月圆时赏月,下雪时赏雪,天晴时也会记录下“晴朗可爱”,吃到了甜甜的桃子鸭梨,也会很开心地记录下来。我想,这种身心合一的、对生活平和而积极的心态,才是我朋友所说的“修身指南”的真正内涵吧!从

读完两册日记起,“每日习静,退处静思”也被我有意识地纳入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之中。

在时间跨度达50年的这两册日记中,可以看到梁漱溟先生读书、写作之勤奋,几乎没有一日不读书,所读之书,不止囊括儒佛道的经典作品,对西方哲学、心理学乃至生物学、医学都有所涉及,值得敬佩。一个人,能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,本身就是一种自律。不过有意思的是,梁先生也曾在日记里责怪自己不够努力,也有对失眠的无可奈何,对打坐时难以入定的懊恼,这种坦诚在一定程度上确乎宽慰了资质平庸的我。

除了读书写作,梁先生的日记中更有各种人情往来、穿衣吃饭的琐事,这也符合儒家于洒扫应对、待人接物中践行修身之道的主张。

梁先生的日记截止到1981年,那时他88岁。读完此书,我更加明确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、涵养品格、修身养性的人生路径,并对此信心坚定。

书人书事



北京历史街名反映当年商业经营特点,如肉市街、花市大街、鲜鱼口街、羊市口街、磁器口大街、灯市口大街等,这些地名都保留了下来。但鸡市口和猪市口却被谐音改名。鸡市口胡同位于朝阳区西部,其南口对着朝阳门外大街,原为鸡鸭市场,故名鸡市口,民国初年谐音更名为吉市口。广渠门内大街有猪市口地名,因此处在明朝时就是热闹的猪市,清宣统年间更名珠市口,1965年将各段街巷合并统称珠市口大街。以上例证都属于街巷地名的谐音雅化。

有些地名用字的谐音或近音转换,基本上是从众从俗的自然演变。例如把大墙缝胡同改为大翔凤胡同、大哑巴胡同改为大雅宝胡同等。街巷历史地名中如带有“猪”“狗”“驴”“臭”“血”“粪”等不雅的字眼,利用谐音法加以改造是必要的。例如北京市东城区的梅竹胡同、珠营胡同,西城区的朱苇箔胡同、小珠帘胡同、智义胡同,在清代分别名为母猪胡同、猪营儿、猪尾巴胡同、小猪圈、猪尾胡同。西城区的高柏胡同、寿逾百胡同、高义伯胡同,在清代都叫做狗尾巴胡同。东城区的打鼓巷,在清代称为打狗巷。东四南大街东侧的礼士胡同,原为明代思诚坊的驴市胡同,清宣统年间谐音改为礼士胡同。礼士路与阜成门外大街相交处有南北两条礼士路,在清代,这里分别叫南北“驴市口”;民国年间,改称南礼士路与北礼士路。“驴市”谐音改为“礼士”,含礼贤下士的雅意。鼓楼东大街南侧的寿比胡同,在明代是以熟皮作坊命名的臭皮胡同;佟麟阁路东侧的受水河胡同,在清代称为臭水河胡同;新街口北大街西侧的时刻亮胡同,原名屎壳郎胡同;天坛路北侧的粉厂胡同,清代称粪厂;珠市口西大街南侧的留学路,在明代是牛血胡同……

这种对粗俗街巷地名的谐音雅化,在清末民初时期很为盛行。更改后的地名,语词含义变得积极、健康,但也带来某种缺憾:部分更改后的新地名,因迁就原地名的读音,使原地名的语源理据完全缺失,显得生硬勉强。例如把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,把烧饼胡同改为寿屏胡同,把轿子胡同改为教子胡同,把羊肉胡同改为洋溢胡同等——“干鱼”变“甘雨”,“烧饼”变“寿屏”,“轿子”变“教子”,“羊肉”变“洋溢”。这种改名单纯追求语音相近,语义变化显得生硬且毫无关联,一是切断了历史文脉,二是使原名的文化理据缺失。因此,对洋溢着市井烟火气的历史地名,应尽量保持原名,不宜擅改。



北京街巷地名的谐音雅化

谭汝为

●华夏地名丛谭